

施里芬計畫第一次世界大戰

林挺生

加拿大魁北克大學蒙特婁分校副教授

摘 要

守勢現實主義對第一次世界大戰起因的解釋中，施里芬計畫扮演了連結重要理論概念的核心角色，但這些國際關係研究卻很少對戰爭計畫的本質進行探討。本文從戰略研究層級的角度分析作戰計畫在整個戰爭行為中的位階，質疑用因果模式將施里芬計畫視為攻勢崇拜代表的命題。經由對德國參謀本部正式部署計畫的理解，以及從新發現的軍事檔案中認識到施里芬作戰思想的變化，我們發現攻勢—守勢平衡理論不能解釋的問題。本文主張從空間、時間、兵力三個要素相互建構的觀點，來重新檢視德國一戰前作戰思想的演變，並提出從施里芬到小毛奇出現了重要的傳統斷裂，由相信防守優越性轉變成攻勢至上。

關鍵詞： 第一次世界大戰、守勢現實主義、戰爭計畫、作戰思想、建構主義

壹、前言

一個世紀前的 1918 年 11 月 11 日，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戰）的交戰國，在康白尼（Compiègne）森林內的火車車廂中，簽署了停戰協議，終止這場長達四年多的血腥殺戮。戰後的各種協議與條約，並未從衝突發生的源頭思考解決之道，而是以嚴懲戰敗國為目的。結果，和約本身反而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二戰）的導火線之一。1918 年用來簽署停戰協議的那節車廂，在 1940 年 6 月法國戰敗後，被德軍從陳列館中取出，用來簽署羞辱法國的停戰協議，清楚地顯示了這兩場大戰之間的聯繫。法國的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將軍 1946 年在巴賀勒杜克（Bar-le-Duc）演講中，將一戰與二戰合稱為「三十年戰爭」（*la guerre de trente ans*）¹，也有其道理。

一戰為重要的歷史事件，自然是歷史學家研究的重點；而在政治學領域，國際關係學科的發展，則與一戰有特別的關係。雖然第一代的古典現實主義（classical realism）學者將重心放在理解德國納粹勢力快速崛起，卻未見國際社會及時反應的現象上；但從 1960 年代晚期開始，另外一些現實主義學者開始回到一戰的主題上，將美蘇之間的核武競爭與安全問題，與一戰之前歐洲強權間的互動進行比較。現在一般稱為守勢現實主義（defensive realism）的學派，正是由對一戰的研究中獲得啟發，發展了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螺旋模式（spiral model）、與攻勢—守勢變項（offensive-defensive variable）等核心概念（Lieber, 2007: 163-64）。

安全困境指涉在無政府狀態的國際體系中，由於無法確定他國的動機與能力，一個國家傾向於將對方的軍備擴張視為敵對行動，即使其出發點是自衛性質的。螺旋模式通常來自安全困境，是兩造間擴張軍備、外交緊張、敵對態度的行動—反應過程（action-reaction process）（Jervis, 1976: 58-113; Jervis, 1978; Glaser, 1997）。攻勢—守勢變項則解釋了安全困境與螺旋動力

¹ 括號內原文正體字為英文，斜體字為德文或法文；人名、地名、河川、山脈一律正體，德文與法文並列時，德文在前法文在後。中東歐地名同時有兩個語言以上不同寫法時，以德文為主。

的強度。當軍事攻擊行動較防禦行動佔優勢時，國際競爭、衝突、或戰爭較可能發生；若是防禦行動佔支配地位，則有機會出現國際合作與和平。攻勢—守勢平衡基本上是由軍事技術發展狀況決定的（Jervis, 1978: 176, 194-199; Glaser & Kaufmann, 1998: 60-72; Van Evera, 1984, 1999; Lieber, 2000）²。

守勢現實主義的學者將一戰視為安全困境、螺旋模式、與攻勢—守勢動力發生作用的經典案例。於 1907 年組成「三國協約」（Triple Entente）的英、法、俄三國，宣稱此舉主要是抗衡德國的崛起，目的在維持歐洲的現況（*status quo*）。但這個行動卻加重了德國被包圍的恐懼，而加速進行軍備擴張，結果使協約國更加確信德國充滿敵意。1914 年的歐陸強權都相信，先發制人的攻勢能取得主要的軍事優勢。由於等待對手澄清其意圖可能會招致軍事挫敗，因此即使是偏好維持現狀的國家都感受到提早發動攻勢的壓力（Jervis, 1976: 92-95; Van Evera, 1999: 207-209）。席捲歐洲政軍界的「攻勢崇拜」（*cult of the offensive*）導致激烈的軍備競賽、僵硬而連鎖的動員時間表、以及帶來危險的先制戰爭（*preemptive war*）誘因，這一切都限制了危機外交處理的時間與手段，德國的施里芬計畫（*Schlieffen Plan*）被視為最佳的例證（Van Evera, 1999: 194-98; Tuchman, 1962; Taylor, 1969; Liddell Hart, 1997 [1930]）。與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將一戰的爆發歸因於德國追求地區性霸權的野心相反，守勢現實主義傾向於認為德國在 1914 年的目標與行動，主要是受到尋求安全的邏輯所引導，德國領導人擔心俄國日漸強大的軍事能力，終將危及德國的國家安全（Mearsheimer, 2001; Sagan, 1986; Lynn-Jones, 1986; Trachtenberg, 1990/91; Levy, 1990/91; Shimshoni, 1990/91; Copland, 2000; Snyder, 1984a, 1984b, 1985, 2008）。

在這些國際關係研究中，雖然一戰被視為包括戰爭在內的一個整體歷史事件來分析，但做為戰爭指導的戰爭計畫（*war plan*），卻少有人深入探

² 范艾弗拉（Stephen Van Evera）認為軍事技術只是整個問題的一部分，必須同時考慮軍事、地理、國內社會和政治因素、以及外交性質的影響。但他的研究卻因此集中在軍事因素之外的其他範疇，連最基本的一戰之前軍事技術發展與軍事準則之間明顯的矛盾也沒有加以解釋（Van Evera, 1999: ch. 6）。Tang Shiping 則深入客觀或主觀攻勢—守勢平衡提出了詳盡的分析（Tang, 2010）。

討。學者們常常直接將歷史學家整理過的戰爭計畫敘述（description）拿來使用，而從中歸納出上述概念與模式，卻從未一睹所謂戰爭計畫的廬山真面目。利伯（Keir A. Lieber）研究了歷史學家關於新發現德國戰爭計畫史料的論戰，但在其論文中最多只提到幾個軍力部署的數量問題，對戰史學家已有重要成果的作戰思想（operational thinking）卻鮮少著墨（Lieber, 2017: 170-71）。這就像從市場行銷策略、人員與預算規模等角度出發，詳盡描述了一個大型開發計畫中企業主管、投資人、潛在客戶、與競爭對手之間的互動，卻忘了介紹建築師的想法與他的設計藍圖一樣。本文的主旨就在尋找這個失落的環節。

貳、戰略研究的層級

戰爭計畫與作戰思想都屬於戰略研究（strategic studies）的範疇。雖然戰略研究要到 1940 年代後期，才在學院中成為一門學科發展起來，它的傳統卻與人類戰爭經驗一樣久遠（Baylis, et al., 2016: 6）。在歐洲語系中，戰略（strategy）這個詞彙來自古希臘文的 *strategia* 或 *strategike*，同時指涉詭計（ruse）與將道（art of generalship）。具有現代軍事意義的戰略用法，則是出現在十八世紀晚期西歐對東羅馬帝國皇帝里奧六世（Leo VI, 866-912）軍事著作的翻譯中（Heuser, 2016: 17）。

關於戰略的定義，至今學界尚未達成共識。本文採用的是格雷（Colin S. Gray）的定義，因為它最能彰顯戰略的角色與特徵。格雷將軍事戰略（military strategy）定義為共同體對武力或武力威脅之運用，以達成由政治決定之政策目的（Gray, 2015: 47）。經由合適的戰略「方法」（way）之選擇，以運用可取得的軍事「手段」（mean），來達成可欲之政治「目的」（end），就是戰略思考的核心。在目的、方法、手段三個要素之外，還可以加上「預設」（assumption）或「信念」（belief）這個外生的影響，像是對我軍軍力的樂觀估計等，常常成為錯誤戰略實踐的根源（Gray, 2015: 10; 2010: 28-33）。從定義來看，格雷主張戰略扮演的是橋樑的角色，其功能在於連結目的與手段。所以，戰略不該有自己的「目的」（end），它只能有戰略「目標」

(objective)；目標的達成永遠是爲了服務於更高的政治目的，沒有獨立存在的理由。一個好的戰略（方法），能使目的與手段達成有生產力的結合，而增加成功的機會（Gray, 2015: 20; 2010: ch. 5）。

區分戰略的不同層級（level），並由動態的觀點進行研究，是從複雜多變的戰局中理出頭緒的重要方法。盧特克（Edward N. Luttwak）細膩的分析架構在這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盧特克將戰略分成五個主要層級：技術（technical），戰術（tactical），作戰（operational），戰區（theater），與大戰略。他的大戰略與格雷類似，範圍超過單純的軍事領域，故在此僅介紹前四個層級。盧特克強調每一個層級有各自需要面對的客觀現實，但它很少能夠與其上下的層級完全無關連地獨立存在（Luttwak, 2001: 89）。

在技術層級中我們關心的是純粹技術標準上的優劣：由步兵攜行的反戰車飛彈，是否能在對抗機械化裝甲部隊的入侵上，產生比戰車之間互相對抗更高的成本效益？這類屬於物質範疇的條件，往往不是戰爭結果的決定性要素。在實際戰鬥發生的戰術層級中，則增加了其他變項：補給與訓練的質量，非物質性的部隊士氣與內聚力，軍官領導統御的水準。歷史經驗顯示，後兩者對戰鬥結果的影響常大於由機械因素制約的武器效能。通常，特定作戰單位在戰術層級的行動，只是交戰各方投入更多其他單位的大型行動中附屬的一部份而已。因此，戰術層級上行動的結果，必然要置於作戰的層級上，才能更全面地衡量。換言之，一個單位進攻或防禦的成敗，只有在它與其他單位一致，形成特定的格局（scheme）時才有決定性（Luttwak, 2001: 87-88）。

在作戰層級中，地圖與部署細節等戰術層級中關鍵要素的重要性降低了，整體性的格局主導作戰的進行。當單一軍種（service）、兵科（branch）與各自的戰術，由於其他軍種、兵科及其戰術也涉入戰鬥，而不再能單獨決定戰鬥結果時，便進入了作戰層級的領域。作戰層級必須超越單純的戰術部分加總，而足以表現出一種具有主導性的「戰爭形式」（style of war），重點就在機動（maneuver）成分的多寡。一戰中從比利時海岸一直延伸到瑞士邊境的漫長戰壕，限制了對峙雙方任何機動的可能性，整個西線戰場停滯爲一種純粹的消耗（attrition）作戰。在這種情況下，一成不變的奪取目標、攻

擊、防禦、與再補給等重複性的戰術就足夠，作戰法（operational art）根本無從實施。相反地，作戰法中的「關連性機動」（relational maneuver）不以最大程度摧毀敵人的有生力量與物質資源為目標，而在於以選擇性的破壞達到癱瘓敵人的效果。關連性機動之開展始於迴避敵人的強處，接著運用我方特殊的優勢打擊敵人物理、心理、技術、或組織上的弱點。戰爭中機動戰的比重，決定了作戰層次行動的重要性；愈是將機動戰視為主要戰爭形式，就愈依賴從整體作戰層次對戰鬥進行思考。二戰初期德軍在波蘭與法國等地進行的「閃電戰」（*blitzkrieg*）就是最佳的機動戰戰例（Luttwak, 2001: 112-17）。

作戰層級的行動在規模上可能十分龐大，但它不可能是自主、獨立的，而是受到更大範圍的戰區內互動所制約。只有在戰區層級中我們才能確認決定性的攻勢與守勢戰略，但不論攻勢或守勢，戰區戰略中都同時存在進攻與防禦兩種作戰法的運用。戰區層級的關鍵因素十分不同，包含了交戰區的整體地理型態、前線的長度與特徵、交戰各方國土的縱深與運輸設施的條件。對盧特克而言，戰略制訂者如果服膺戰略內在的邏輯，勢必只將地理因素在軍事上的意義納入考量：邊界長短對攻守行動的影響、地形的障礙價值、國土縱深與戰爭結果的關係、所有與部隊進出機動有關的規劃等。然而，這個層級常受到政治因素的直接介入，將領土的經濟、社會、文化、心理特性強加在軍事計算之上，而使戰略制訂更為複雜（Luttwak, 2001: 138-39）。下文將使用盧特克的戰略層級架構，分析政治學者未曾深入的德國戰爭計畫，並提出與現實主義不同的方法來處理作戰層級空間、時間、與兵力三要素之間的關係。

參、德國戰爭計畫的制訂與形式

任何一本與一戰有關的歷史，都會提到德國的施里芬計畫，但這並非 1914 年德軍發動攻勢時採用的戰爭計畫，這個誤解對國際關係理論有重大影響³。讓我們先從德國戰爭計畫的制訂過程開始說明。

³ 在德國關於一戰戰爭計畫的論戰，從一戰一結束便已開始（Zuber, 2002: 20-28）。

德國參謀本部 (Great General Staff, *Großer Generalstab*) 從 1837 年起，就是個獨立的建制（當時仍稱為普魯士參謀本部）⁴。參謀本部的任務包括調查與製作全國的地圖，蒐集外國軍事情報，軍隊應戰的準備，最重要的是負責兵力動員與實際作戰的執行 (Gross, 2014: 86-87)。在此需要指出，國防預算與徵兵數量屬於戰爭部的職權，參謀本部無法直接干涉。參謀總長是參謀本部的最高首長，由德皇直接任命，自 1883 年起並得到直接謁見德皇的特權。除了對參謀軍官的戰略與戰術訓練外，參謀總長更是德軍戰爭計畫的主要設計者。戰爭計畫是以部署計畫 (deployment plans, *Aufmarschpläne*) 的形式制訂，以一個動員年度 (4 月 1 日起) 為期實施⁵。完整的部署計畫為最高機密等級，留在參謀本部中，各野戰軍只在動員年度開始時收到與本身任務有關的部署指令 (deployment directives, *Aufmarschanweisungen*)⁶。整個計畫流程每年都會執行，而內容也會根據需要修改。按規定所有部署計畫與其他最高機密文件，在每個動員年度結束時必須銷毀 (Gross, 2014: 87)。

由於規定並未徹底執行，部分檔案與副本因此保存了下來。1919 年 10 月成立的國家檔案局 (Reich Archive, *Reichsarchiv*) 保存了一批參謀本部的檔案，後來移交給 1936 年 4 月成立的陸軍檔案局 (Army Archive, *Heeresarchiv*)。即便不完整，這批檔案中包含了兵棋推演 (war game, *Kriegsspiele*)，參謀現地調查 (General Staff ride, *Generalstabsreisen*)⁷，以及 1890-1914 年施里芬 (Alfred von Schlieffen) 與小毛奇 (Helmuth von Moltke the Younger) 的主要任務指令 (key tasking, *Schlussaufgaben*)。1945 年 4 月，在一次英國空軍轟炸行動中，幾乎所有陸軍檔案局的重要文件都付之一炬，但早先移到德國南部的部分施里芬檔案則逃過一劫，後來被美軍尋獲並送到美國國家檔案館收藏 (Gross, 2014: 87-88)。

⁴ 參謀本部也可譯成總參謀部，兩者無意義上的差別，本文使用台灣通用的名稱。

⁵ 本文的戰爭計畫是狹義的軍事計畫，因此主要指涉作戰計畫 (operational plan)。

⁶ 一個德國現役野戰軍通常由兩個師組成。

⁷ 參謀現地調查在老毛奇 (Helmuth von Moltke the Elder) 時代，確實經常到預計可能成為戰場的地區實地觀察與操作；施里芬時代是否每年的東、西線現地調查都親自到邊境進行，則沒有確實史料可證明，可能有時採用圖上演習的方式代替。

德國戰史學家里特（Gerhard Ritter）在二戰後獲准查閱這些文件，並於 1956 年出版了他對施里芬 1905 與 1912 年兩份備忘錄（memorandum, *Denkschrift*）的研究（Ritter, 1958 [1956]）。里特的著作成為之後將近半個世紀討論施里芬計畫的唯一參考。兩德統一後不久，在將原先保存於東德人民軍檔案局的軍事檔案整合到聯邦檔案局（*Bundesarchiv / Militärarchiv*）時，發現了一批二戰後被蘇聯尋獲，並於 1980 年代歸還東德的一戰前後軍事檔案（Gross, 2014: 88-91）。這些開放給所有人申請查閱的資料，具有極高的歷史價值，也掀起戰史學界一場長達十餘年的論戰（Ehlert, et al., 2014: 8）。這個由發現新史料引起的衝擊，至今仍在持續產生影響，而它所帶來的釐清史實效果，對國際關係學界的影響還不明顯，部分原因在於國際關係學界似乎抗拒處理繁瑣的軍事細節（Lieber, 2008; Snyder, 2008）。

德國戰史學家們已經將 1893-1914 年參謀本部制訂的部署計畫重建，以附錄形式與十餘篇關於一戰的新論文於 2006 年發表，該書在 2014 年出版了英譯本（Ehlert, et al., 2014）。在此以施里芬任期內負責的最後一個部署計畫（1906-1907 年度）為例，來介紹其形式與內容。德國參謀本部部署計畫一般都包含兩套作戰部署：部署計畫一（*Aufmarsch I*），單獨對法作戰；部署計畫二（*Aufmarsch II*），同時對法、俄作戰（表 1、2）。本計畫原始檔案上有手寫「部署計畫一與 1905 年 12 月施里芬備忘錄一致」的頁緣說明⁸。計畫主體分為八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動員時間表（mobilization schedule）。第二項（Item 2）中清楚指出了兵力配置：在單獨對法作戰的想定（scenario）中，沒有佔領任務的所有兵力都將集中於西線戰場，計 26 個現役軍（army corps），12 個後備軍（reserve corps），3 個預備師（reserve division），11 個騎兵師（cavalry division），26½ 個地方民兵旅（*Landwehr brigade*），共組成 8 個軍團（army）。在對法、俄同時作戰的想定中，7 個軍團將被部署於西線（第 1 與第 3 到第

⁸ 根據這個說明，可以與里特的施里芬備忘錄內容進行比較，深入理解施里芬的作戰思想具體化為部署計畫的細節。這個正式部署計畫仍包含兩個想定：單獨對法作戰，與同時對法、俄作戰，但後者的計畫極為簡略，顯示重心完全在西線戰場。

表 1：單獨對法作戰

第 1 軍團		5 個後備軍			
第 2 軍團	4 個現役軍			5 個民兵旅	
第 3 軍團	4 個現役軍	1 個後備軍		4 個民兵旅	
第 4 軍團	4 個現役軍	1 個後備軍	1 個預備師	4 個民兵旅	
第 5 軍團	5 個現役軍			3 個民兵旅	
第 6 軍團	5 個現役軍			6 個民兵旅	
第 7 軍團	3 個現役軍	1 個後備軍	2 個預備師	1 個民兵旅	
第 8 軍團	1 個現役軍	4 個後備軍			
軍團騎兵					11 個騎兵師
上萊茵河地區				3½ 個民兵旅	
總 計	26 個現役軍	12 個後備軍	3 個預備師	26½ 個民兵旅	11 個騎兵師
海岸防衛				1½ 個民兵旅	

表 2：同時對法、俄作戰

第 1 軍團		3 個後備軍	1 個預備師		
第 3 軍團	6 個現役軍	1 個後備軍		6 個民兵旅	
第 4 軍團	4 個現役軍	1 個後備軍	1 個預備師	4 個民兵旅	
第 5 軍團	4 個現役軍			1 個民兵旅	
第 6 軍團	5 個現役軍			4 個民兵旅	
第 7 軍團	3 個現役軍		2 個預備師	1 個民兵旅	
第 8 軍團	1 個現役軍	3 個後備軍			
軍團騎兵					9 個騎兵師
上萊茵河地區				3½ 個民兵旅	
總 計	23 個現役軍	8 個後備軍	4 個預備師	19½ 個民兵旅	9 個騎兵師
海岸防衛				1½ 個民兵旅	
東線軍團	3 個現役軍	3 個後備軍	1 個預備師	7 個民兵旅	2 個騎兵師

8 軍團)，包括：23 個現役軍，8 個後備軍，4 個預備師，9 個騎兵師，與 19½ 個地方民兵旅。東線軍團由 3 個現役軍，3 個後備軍，1 個預備師，2 個騎兵師，與 7 個地方民兵旅組成。

第三項中分配了海岸防禦的兵力。第四項要求為義大利承諾的 5 個現役軍與 2 個騎兵師援軍，在其上萊茵河（Upper Rhine）防區做好準備，但指

出義大利是否支援將視政治情勢而定。第六項說明在對法、俄同時作戰的想定中，第 2 軍團的準備工作將停止，而以東線軍團的準備令代替。第十項，爲了達到欺敵效果，上亞爾薩斯（Upper Alsace）與巴登（Baden）南部原駐防部隊的準備命令將被包含在第 14 與 15 軍的部署命令中。第三十四項，考慮爲最高統帥部（Supreme Headquarter, *Oberste Heeresleitung* / OHL）⁹ 直接影響之外的西線戰場任命一個軍團司令爲總指揮（commander-in-chief）。

第二部分是兩個作戰的戰鬥序列表（order of battle），以及北方海岸防衛的序列。第四部分是整個計畫的核心，詳細規劃了單獨對法作戰中各軍團的組成、集結地、與任務，並對法國兵力部署進行研判。限於篇幅，以下僅譯出第 1 軍團的部署。(1) 組成：5 個後備軍（第 1、4、7、9、11 後備軍）；(2) 軍團司令部：杜塞爾道夫（Düsseldorf）；(3) 初始部署：一個後備軍（第 9）於荷蘭邊界處戈赫河（Goch）兩側的戈赫—桑騰（Goch-Xanten）地區集結，其餘 4 個後備軍在萊茵河東岸韋塞爾（Wesel）與柯隆（Cologne）之間地區集結；(4) 任務：本軍團負責主力進攻部隊（德軍右翼）的右側翼掩護，前進方向爲安特衛普（Antwerp），其左側之第 2 軍團則指向布魯塞爾（Brussels）。第五部分爲單獨對法作戰時，東部邊界的安全部署。第六部分爲同時對法、俄作戰時東線的兵力部署，各單位的駐地，及其防禦的任務。第七部分爲海岸防禦（大綱）。第八部分北方部署爲海岸防禦的詳細內容，說明在敵人登陸時，如何組織反擊行動（Ehlert, et al., 2014: 416-35）。

以上爲單一動員年度部署計畫的簡介，可以看出是屬於盧特克分類中的戰區—作戰兩個層級結合的戰爭規劃，絕少涉及政治與外交層面的內容。若將不同年度的計畫加以比較，便可深入理解參謀本部作戰架構的發展輪廓（Zuber, 1999; Holmes, 2001; Gross, 2016）。如果想要深入作戰思想的實質內容，則必須依賴不同表現形式的史料：備忘錄（memorandum）。

⁹ 德軍戰時最高指揮機構，總司令通常由參謀總長擔任。

肆、施里芬作戰思想的發展

普法戰爭造就了統一的德意志帝國，中歐的地緣政治因此產生了巨大的變化：保持奧匈帝國的完整成了德國的核心利益，德國也成了俄國的敵人，在下一場戰爭中，俄國必定會全力攻擊德國。這是指揮普魯士精兵悍將完成統一大業的老毛奇，在之後近二十年內一直堅持的判斷。1871 年春，巴黎還因公社革命（*Commune de Paris*）陷於極度混亂，德軍依舊佔領著法國東部大片領土，老毛奇已在一篇備忘錄中開始思考對法、俄兩面作戰的計畫。令人意外的是，普法戰爭的勝利並未給他帶來安全感，相反地，卻讓他認識到一個現代國家抗拒求和的能力與決心。從這個經驗出發，他發覺寄望於內線優勢，先快速擊敗一面之敵，隨後轉向另一面，已是過度樂觀的想像，因為擊敗第一個敵人就將耗費太多時間（Zuber, 2002: 58-59）。戰略空間的變化作用於時間，形成一個全新的限制架構，要求作戰思考加以適應。

老毛奇的計畫是將德國所有兵力均分為二。在西線部署 9 個軍共 30 萬人：4 個軍集結於史特拉斯堡（Strasbourg），另 4 個軍加上黑森師（Hessian Division, *Großherzoglich Hessische Division*）集中於麥次（Metz），第 31 師鎮守慕爾豪森（Mülhausen, Mulhouse），位於上亞爾薩斯。由於法軍最多也只有 30 萬人，所以西線不會有危險。在東線，德國的 9 個軍將與奧軍入侵波蘭，採取攻勢行動。此處凸顯了老毛奇希望在德、俄之間建立一個緩衝空間的大戰略構想。對他而言，俄屬波蘭形成一個巨大的突出部隔開德、奧兩個「天然」的盟國，也代表「落後」的斯拉夫民族對中歐日耳曼民族生存空間的破壞。因此，首要之務是將波蘭從俄國獨立出來，如果俄國失去波蘭，就會被「趕回亞洲去」。這個計畫根本不是兩面作戰，在西線也不可能有所謂的法軍攻勢（法軍已經支離破碎亟待重整），而是一個純粹攻擊俄國的作戰（Zuber, 2002: 60-61）。

在 1877-1879 年中，老毛奇規劃了兩套基於完全不同想定的作戰計畫，包括 1877 年對法國、奧國作戰，1877 與 1879 年對法國、俄國作戰。前者在 1879 年德奧同盟簽訂後，就不再具有現實上的意義，但卻是從這個作戰

備忘錄起，老毛奇開始以嚴肅的態度看待法國東部的要塞體系。計畫中提到，如果將德軍等分為二，在東、西線都將處於 1:2 的數量劣勢，所以他決定採取內線的守勢戰略：必須先將一面之敵擊敗，並且要讓對方主動求和，德軍才轉向另一面作戰。德軍必須攻擊（反擊）奧國，而在西線於萊茵河一線採取守勢抵抗法國。他注意到法國邊界要塞體系與巴黎重新要塞化對任何德軍攻勢的影響：即使德軍擊敗法軍，他們還是可能安全地撤退到要塞防線後方。這個重要的觀察雖未經實戰證實，卻被之後的繼任者視為理所當然的前提。德國在西線可能要放棄洛林（Lorraine）與法爾茲（Pfalz）地區而在萊茵河一線防守，若法軍渡過萊茵河，德軍將退入側翼位置（flanking position, *Flankenstellung*）的美因河（Main）一線據點（Zuber, 2002: 70-72）。

老毛奇在思考對法、奧作戰的同時，也著手設計了對法、俄作戰的計畫，並在 1879 年大幅改寫，將兩案面呈德皇，成為促成德皇接受德奧同盟的重要論據。1877 年的計畫中，時間是最重要的因素，而要塞也因其直接影響軍事行動的時間而益發重要。由於法軍能在動員開始第 12 天完成準備，並以急行軍入侵洛林，老毛奇擔心麥次要塞無法及時完成備戰。東線的俄軍雖在宣戰之前已進入半動員狀態，但估計仍須 16-20 天將兵力集結於科夫諾（Kowno）—拉多姆（Radom）一線，另需 5~10 天才能抵達德國邊界。這個計畫的結論是德軍必須先攻擊法國，因此在俄國宣戰之後，不論法國立場為何，德國都必須立刻對法宣戰並發動攻勢。德國將部署 14 個軍 52 萬人於西線，只留下 4 個軍 8 萬人在東線。德軍立即的攻勢（或許由於對要塞可及時就緒沒有信心）將與法軍的進攻正面對決，而德軍將在第 3 週贏得決定性會戰。東線德軍則在俄軍完成其主力部署之前，便以 6 萬人對波洛克（Plock）進行突襲，且必須不惜任何代價守住托倫（Thorn）這個鐵路樞紐。擊敗法軍之後，將調遣 22 萬人到東線，留下 25 萬人防守萊茵河一線（Zuber, 2002: 72-73）。

同樣的想定，在 1879 年卻從西線部署（*Westaufmarsch*）大翻轉為東線部署（*Ostaufmarsch*），主要的原因是老毛奇認為法國的要塞體系太堅固，不可能在西線取得決定性戰果。他的作戰概念，是以最少的兵力：包括 4 個

軍與 1 個步兵師，加上強大的要塞守軍，以麥次、史特拉斯堡、與萊茵河為據點進行防禦戰。對敵我要塞的研判與運用，在極大程度上決定了整個作戰的基調。早在 1875 年，老毛奇便曾設想 36 個法國師攻擊 9 個德國師的西線戰局，當時的結論依舊適用：德軍唯一的機會是在與敵接觸之前便後撤，不計任何代價避免決定性會戰。老毛奇認為奧國至少會持武裝中立的態度，如此俄軍就必須在奧俄邊境上部署監視兵力。德軍的企圖在佔領波蘭，因此不會深入俄境。在波蘭的勝利將使德軍得以轉運至西線對抗法軍（Zuber, 2002: 74）。

這個作戰概念是在俄軍率先發動攻擊的假定下形成的，其最大風險在於對作戰空間的理想化，導致時程的安排顯得不切實際。萬一東線有所延誤，唯一能保證不至於全盤皆墨的，只有西線要塞防線抵擋法軍攻擊的能力。計畫中德軍在第 23 天完成東線部署，法軍此時已抵達萊茵河；第 29 天德軍逼近華沙（Warsaw），而法軍可能已抵達美因河。即使在最理想情況下，第 29 天發生決定性會戰，勝利的德軍還要回頭走 6 天才能上火車，再加上鐵運時間，屆時法軍恐怕已經深入巴伐利亞（Bavaria）。東線的決定性會戰更是一廂情願，就算俄軍真的願意保衛波蘭，也很難想像俄軍會在第 29 天以 19 個師接受與德軍進行決定性會戰，而不是先向東撤，等待額外的 21 個師完成集結。率先發動攻勢不等於會接受決定性會戰。對法國要塞實力的誇大，似乎影響了對己方要塞的認知，進而扭曲了關於時間的掌握：德軍打不進法國要塞體系，不代表法軍就要花同樣時間等在德國要塞之前；況且兩面受敵的不是法國，佔領柏林也從不是法軍唯一選項，時間壓力對法軍不成問題，但絕對是德軍的致命傷。德皇威廉一世（Wilhelm I）讀出了計畫要傳遞的一個本質上極端悲觀的訊息：在任何一個兩面戰爭中，單憑德國一己之力絕無勝算。所以他最終同意了德奧同盟（Zuber, 2002: 75-96）。

整個 1880 年代是要塞現代化與高爆彈藥爭奪技術優勢地位的重要階段。參謀本部內作戰思考在世代交替之際的爭執，同時被置於國際政治瞬息萬變、進攻（砲兵）防守（要塞）技術快速發展、與鐵路網擴張重塑對空間與時間認知的複雜脈絡中。八十高齡的老毛奇，從德意志民族仍分崩離析的年代帶來中歐強權統一志業的政治熱情，已被下一世代更偏重從軍事理

性冷靜分析作戰條件的文化挑戰，施里芬正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德國參謀本部對參謀軍官的訓練，主要是通過年度參謀現地調查與兵棋推演兩種常態的作戰應用演練來進行；此外還有由施里芬親自出題的年度戰術—戰略測考（problems in tactics and strategy, *Die taktisch-strategischen Aufgaben*）。參謀軍官在這些訓練科目中的表現，都是未來晉升的主要依據（Foley, 2014: 72-73；Holmes, 2004: 665-666）。施里芬在這些教育訓練過程中留下的評論，是研究他作戰思想發展的重要線索。前文提及引發論戰的一戰新史料中，最具分析性的就是由兩次大戰期間任職於國家檔案局的狄克曼（Wilhelm Dieckmann）根據這些評論所寫的幾篇施里芬研究，我們可從中看出施里芬作戰思想的階段性變化（Gross, 2014: 94-95; Zuber, 2004: 49-121）。

施里芬於 1891 年接任參謀總長一職時，參謀本部對未來兩面戰爭（two-front war）的構想，是遵循老毛奇以來，將作戰重心放在東線攻勢，而在西線採取守勢的指導¹⁰。施里芬質疑俄軍會被輕易擊潰的樂觀想法，強調俄國鐵路建設已改善了動員的速度，加上納雷夫河（Narew）一線要塞系統的完成，使正面攻擊成為唯一選項。然而，正面攻擊不可能對俄軍造成決定性的打擊，逃過殲滅戰（battle of annihilation）攻勢的俄軍，必然會後撤進入具有廣大縱深的內地，戰爭將無止盡地延長下去。1892 年的部署計畫中，施里芬將作戰重心全盤改變，把大部分德軍兵力轉到西線¹¹。1894 年，施里芬以對法軍發動快速攻勢為基礎撰寫了一篇備忘錄。因為他對長期採取防守態勢的效用沒有信心，並擔心法軍可能突破德軍正面，於是他要加速德軍的部署來發動立即的攻勢，以確保德軍在接敵時擁有數量上的優勢，能在大規模會戰中決定性地擊敗法軍。如果法軍未如預期發動攻勢，施里芬則打算以重型火炮攻擊南錫（Nancy）附近的要塞體系¹²。然而他很快地

¹⁰ 老毛奇也曾在 1877 年寫過將作戰重心放在西線的備忘錄（Zuber, 2002: 72-73）。

¹¹ 根據祖伯（Terence Zuber），這個轉變從瓦德西（Alfred von Waldersee）任參謀總長時代（1888-1891）就已開始（Zuber, 2002: 103-106）。

¹² 施里芬的攻擊常常代表反擊，造成很大的誤解，只有在其脈絡中才能分辨真實的意圖。這個備忘錄（1894）中，施里芬事實上是假設法軍發動對德戰爭，而德軍捨棄過去被動

瞭解到，對法國東部堅強的要塞防線進行正面攻擊，不可能達成快速而決定性殲滅敵軍的目標。在 1897 年的備忘錄中，他還是放棄了正面突破要塞體系的想法，並清楚地表示：德軍對法國的攻勢，必須經由一條需要克服最少要塞防禦的路線，才有成功的機會。經過對各種方案的仔細評估，考量到孚日山區（Vosges）與比利時、盧森堡國界之間的通道太過狹隘，不利德軍大部隊展開，他選擇了從凡爾登（Verdun）北面迂迴（outflank）要塞防線，再南下從法軍後方發動攻勢，一舉切斷巴黎與法軍主力間聯繫的方案（Gross, 2016: 79-80）。

1904-1905 年度之前的部署計畫、參謀現地調查、與兵棋推演，都顯示施里芬傾向於採用包圍作戰（envelopment operation），雖然他也清楚風險所在。他的作戰企圖（operational intention）隨著對法方領導人意圖的研判而改變，但大規模的包圍行動並非他獨鍾的方案。對施里芬而言，包圍作戰計畫面臨兩個核心問題：如果法軍決定藏身要塞內以拖待變，該如何應對？另外，如果俄軍動員速度比預期要快，又該如何處置？萬一這兩項憂慮都成為事實，那施里芬規劃的先快速擊潰法軍，再將全部兵力東調與俄軍對決的方案就土崩瓦解了。在這樣的軍事災難中，德軍將很難抵擋法、俄的向心攻擊（concentric attack）。施里芬確信，只有在一開戰就以立即的攻勢行動來迫使法軍接受決定性會戰（無論是誰挑起戰端），才有可能突破這個困境（Gross, 2016: 80-81）。

1902 年間，施里芬得到法國已察知德軍包圍計畫而準備了反制措施的情報後，馬上就對部署計畫進行修改。1902-1903 年度的部署計畫中，將德軍主力第 2 到 6 軍團共 18 個軍，集中在直接面對法國與盧森堡的邊境處，第 1 軍團則在較遠處保護主力側翼的安全。施里芬企圖同時攻擊南錫與圖勒（Toul）—凡爾登之間的正面。他希望以德軍右翼挫敗預期的法軍北向攻勢，待法軍被擊退，這支部隊將迴旋南下，於凡爾登下游處渡過默茲河

防守的策略，在被攻擊之後轉入攻勢「反擊」。如果不深入理解，很容易產生如守勢現實主義者所顯示施里芬總是要發動侵略戰爭的印象（Zuber, 2004: 53-55; Holmes, 2014: 205）。

（Meuse），打擊法軍的背面。因此，這個作戰計畫結合了包圍行動、反擊、與正面攻擊三個形式（Gross, 2016: 81）。

1905-1906 年度的計畫出現了值得注意的改變。比起上個年度只在提翁維爾（Diedenhofen, Thionville）以北至荷蘭邊界部署 8 個現役軍與 6 個後備師，大增為 17 個現役軍與 2½ 個後備軍。施里芬從未在右翼集中如此多的兵力。至此，他將小規模的凡爾登北面迂迴行動擴大為進入比利時向布魯塞爾前進，再指向里爾（Lille）方向的大迴旋包圍。這也是他首次決定要侵犯荷蘭的中立地位。為何施里芬在 1904 年要以嚴重的政治與作戰風險為代價大幅更動部署計畫？從最新的史料中可以得知，政治考量與法軍狀況是他做出這個決定的原因。1904 年夏天，參謀本部的情報單位相信，由於俄軍在日俄戰爭（1904-1905）中的挫敗，在德、法發生衝突時俄國很難出兵支援，所以法國不太可能在開戰時採取攻勢。彼時法軍將部隊向北調動，就是轉向以防禦預期中德軍迂迴要塞體系作戰為主，放棄在亞爾薩斯—洛林方向發動入侵的證據。以這些情報為基礎，施里芬在 1904 年第一次參謀現地調查的事後檢討中，就對之前通過凡爾登—梅濟耶（Mézières）北面的包圍計畫提出質疑，他擔心德軍可能無法迫使法軍離開其要塞陣地。於是他首次提出了以主力攻擊較少要塞陣地的梅濟耶—里爾一線的想法，要以更大規模的迂迴行動將整個法國要塞體系完全繞過。這個作戰思想構成了施里芬計畫的核心（Gross, 2016: 82-83）。

伍、施里芬計畫的內容與解釋

現在我們稱之為施里芬計畫的文件，是施里芬在退休之前開始動筆（文件日期為 1905 年 12 月），於 1906 年 2 月交給繼任者小毛奇的一套作戰計畫（operational plan）備忘錄。文件的寫作格式與正式部署計畫不同，採取的是備忘錄體裁，因此也稱為 1905 年的備忘錄（Great memorandum of December 1905, *Große Denkschrift*），標題為：對法戰爭（War Against France, *Krieg gegen Frankreich*）。最早且最完整的版本收錄於里特（1958）的《施里芬計畫》中（Holmes, 2001: 208; Gross, 2014: 95）。以下為計畫核心部分

的節譯：

法軍在對德戰爭中，只要無法期待俄軍實質的支援，可能就會採取防禦態勢。法國在東部邊境修築了大部分為永久性的要塞，其中以貝爾福（Belfort）、艾皮納（Épinal）、圖勒、與凡爾登防禦能力最堅強，可庇護大量法軍，並給德軍行動造成極大的困難。由於不可能對這些要塞進行包圍，而攻城行動只能從一側發動，必將耗費龐大的兵力與時間，因此德軍攻勢不可能指向這個地區。

較為可行的是由西北方向發動攻勢，指向梅濟耶、賀戴勒（Rethel）、拉費賀（La Fère）的側翼，渡過瓦茲河（Oise）打擊敵人陣地的後方。這個行動必須侵犯比利時、盧森堡、與荷蘭的中立地位。德軍的右翼部隊將在麥次與韋塞爾之間集結，包括 23 個現役軍，12½ 個後備軍，與 8 個騎兵師。在主力部隊進行向凡爾登—敦克爾克（Dunkirk）一線大迴旋運動時，位於北面的後備軍主要負責右側翼的安全，特別是防範來自安特衛普的攻擊；位於南面的後備軍保障左側翼的安全，抵禦來自摩澤爾河（Moselle）左側圖勒—凡爾登一線法軍的攻擊。

德軍左翼由 3½ 個現役軍，1½ 個後備軍，與 3 個騎兵師組成，停駐於摩澤爾河右側（里特書英文版誤譯為左側）。這些部隊在一開戰時立即對南錫發動攻勢，以吸引盡可能多的法軍部隊，使之無法北上。稍後，這部分兵力將整合到德軍主力左側翼的安全保障任務中，或北上加強右翼實力。麥次要塞將成為擔負上述側翼防護任務部隊的屏障，大量的野戰工事將沿摩澤爾河、薩爾河（Saar）、與尼耶德河（Nied）連結起來，重砲與地方民兵部隊也將進駐。麥次本身就會牽制為數眾多的法軍。

德軍有希望以右翼包圍的作戰取勝，因此右翼必須盡可能地強大。(I) 8 個現役軍與 5 個騎兵師將兵分五路於列日（Liège）下游渡過默茲河，朝布魯塞爾—那慕爾（Namur）方向前進。一個現役軍（第 18 軍）必須攻取于伊（Huy），於列日上游渡過默茲河加入前者。這 9 個現役軍將有 7 個後備軍同行，其中一部分將留下來監視安特衛普，其餘則加強對右側翼的保護。另外，還可能從左翼以鐵路運送 2 個現役軍增援，這些兵力可能帶來決定性戰果。(II) 朝向梅濟耶—那慕爾方向默茲河段前進的有 6 個現役軍與 1 個騎

兵師，加上1個後備師；朝向梅濟耶—凡爾登方向前進的則是8個現役軍與2個騎兵師，這支部隊的左側翼由5個後備軍加以保護。10個地方民兵旅將加入默茲河以北的大部隊，6個加入以南的部隊，3個駐防麥次要塞，1個防守下亞爾薩斯¹³。

不論是經由比利時境內的會戰勝利，或是成功攻陷法境的要塞陣地，還是沒有遭遇大規模的抵抗，一旦突破默茲河左側的法國要塞區域，德軍必須向東迴旋，打擊梅濟耶、賀戴勒、拉費爾陣地的左面。默茲河上梅濟耶—凡爾登間的前沿陣地可能會提前撤守，同樣地，恩河（Aisne）上拉費爾與漢斯（Rheims, Reims）之間的法軍也不會被動地等待其左側翼受到攻擊。他們可能會嘗試尋找新的陣地，或是發動反擊。後者對德軍有利，因為潰敗的法軍不會是以緊密正面接敵的德軍之對手。但如果法軍退向恩河—瓦茲河一線，或是更遠的馬恩河（Marne）與塞納河（Seine），組織新的防線，德軍將被迫由巴黎西側包圍這個巨大的要塞。到了這個時候，無論我們已經做了多少準備，都將發現我們的兵力太過弱小，不可能繼續完成包圍並殲滅法軍的目標。歷史的經驗將再度印證：入侵者的力量日衰，而防守者的力量日增。想要在這場戰爭中取勝，唯有讓右翼更為強大。因為決定性的會戰是由右翼主導的（Ritter, 1958: 134-148）。

施里芬計畫一向被視為攻勢崇拜與短暫戰爭幻覺（short war illusion）的產物（Lieber, 2007: 181; Snyder, 1984a: 110, 115-16; 1991: 108-109; Van Evera, 1984: 89-90; 1999: 19）。守勢現實主義視其為典型的案例，用來支持攻勢—守勢變項對一戰爆發的解釋。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戰爭起因的分析，但他們對施里芬計畫的理解卻大有問題。首先，就戰略層級而言，施里芬以其參謀總長身份擬定的，是戰區—作戰層級的計畫。大戰略層級的最高決策，實際上是由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 II）與內閣成員共同做出的，是和是戰，對施里芬而言是給定的條件。甚至準備戰爭不可或缺的資源，

¹³ 施里芬在此的敘述極易造成混淆，以致後來引發小毛奇是否削減右翼兵力比例的爭論。為了不改變施里芬原始段落的面貌，我們只加上(I)與(II)來說明：(I)部隊是狹義的右翼兵力；(I)加上(II)則是廣義的「穿越比利時」右翼，或是施里芬自己說的「德軍主力攻擊部隊」。

如國防預算、兵力規模、武器研製、要塞現代化，也是掌握在戰爭部長手中，視帝國政治狀況而定，並非參謀本部可單獨決定的（Herwig, 1994: 246-49; Gross, 2016: 74-75; Stevenson, 2012: 847-54）。即使戰爭計畫本身的性質不必然導致預防性戰爭（preventive war）的發生，但一個以機動攻擊為主，旨在進行快速殲敵作戰的計畫，確實可能成為政治決策者考量是否使用戰爭為工具的前提條件（Gross, 2016: 50-51）¹⁴。因此，對施里芬計畫內涵的誤解，就直接影響解釋戰爭起因之研究的有效性（攻勢崇拜背景下相信戰爭可在短時間內結束）。與學界習以為常的看法不同，施里芬計畫不是一個兩面戰爭的作戰計畫，而是如其標題所言：是單獨對法作戰的計畫（Gross, 2016: 84; Holmes, 2001: 211）。如果不是兩面作戰，所謂德軍只有6週的時間擊敗法國，然後轉向東線對抗俄國大軍的說法，就不適合用來討論施里芬1905年的備忘錄了。同樣地，施里芬計畫的內容也不能用來驗證任何與1914年戰爭爆發相關的理論假設。

由於戰爭的想定不同，構成作戰計畫核心的三大要素：空間、時間、兵力，就必須置於各自不同的脈絡中，來分析三者之間互相建構的過程。每一個地理區域都是由空間的型態（shape, *Gestalt*）與通過所需的時間（time, *Zeit*）來共同定義的。在戰爭狀態下，敵我雙方的兵力（人員與裝備）在特定的軍事地理條件中，與時間、空間不斷地互動，形成戰爭的動態發展過程。時間、空間雖有其客觀的物理性質，但在戰爭這樣的人類活動中，建立在物質性之上的意義卻非客觀不變的，應該超越機械的數學模式，從不同行動者主觀認知的角度來分析，才能掌握更為整體的認識¹⁵。

位居歐洲中部的地理形勢，使德國參謀本部一直將兩面（甚至多面）作戰的危險視為必須嚴肅面對的戰略難題。從老毛奇以來，利用內線（interior line）優勢，快速擊敗一邊的敵人，再迅速調動至另一邊接敵的作戰法，就已成爲德軍訓練的重點。但這種對空間的認知並非一成不變的，在老毛奇

¹⁴ 利維（Jack Levy）提供一個不同的角度來討論預防性戰爭，並強調預防性與先制性戰爭的本質差異（Levy, 2014: 139-66）。

¹⁵ 關於這一點，克勞塞維茲（Carl von Clausewitz）在批評比洛（Heinrich von Bülow）宣稱能以三角函數的計算來解決戰略問題時就已經說過（Clausewitz, 1993 [1832]: 409-10）。

時代，由於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卓越的外交手腕，兩面作戰似乎只是「理論上」的問題；到了施里芬為參謀總長時，國際政治與軍事技術上的變化使得兩面受敵成為「現實上」的威脅（Gross, 2016: 59）。1894 年法俄聯盟的形成，使衝突發生時法、俄同時對德作戰成為必然的結果。雖然鐵路的發展讓內線優勢的利用更有效率，但也同樣使法俄的向心攻勢加速。這種對空間的認知也改變了對時間的認知。在首先接戰的一面（不論是入侵攻勢或自衛反擊），必須以最快的速度取得決定性戰果，才有機會在另一面也獲得勝利，作戰計畫因此處於緊迫的時間壓力之下。

對時間、空間的認知，必然影響到兵力配置的思考，但同樣不是單向決定的。在兩面作戰的想定下，時間空間以一種壓力的形式，限制兵力安排的方式並要求強大的機動力；但我們也發現，不同的計畫制訂者對局勢的主觀判斷，也會改變對敵我兵力對比的感受，進而產生不同兵力配置的偏好，結果是重塑了對時間、空間的認知。如前述老毛奇將兵力一分為二，但以東線為攻擊重心，而在西線採取守勢。這不是因為他認為俄國比法國寬廣得多的防禦縱深不重要，而是 1870-71 年普法戰爭在色當（Sedan）會戰之後演變成曠日廢時的人民戰爭（people's war），讓他心生警惕。加上他所處的國際環境，也還存在一、兩場決定性會戰足以結束戰爭的可能性（法國是例外），因此大型殲滅戰並非首要考量（也就不必擔心俄軍退入其腹地採取縱深防禦堅守），時間、空間、與兵力三個要素作用的方式也不同（Gross, 2016: 46-53）。

但是在施里芬時代，同樣是兩面作戰，卻朝向完全不同的方向發展。弔詭的是，愈是在政治上難以接受因一兩場會戰的挫敗便決定戰爭勝負，對會戰的決定性反而愈加重視。於是施里芬及其同時代人將大型殲滅戰視為快速結束戰爭的良策，兩面作戰的時間、空間壓力也成倍地擴大；由於必須在單獨與一面之敵接戰時保持數量優勢，結合了現代防禦火力的進步，更讓兵力需求快速膨脹。結果，為了讓百萬人以上的大軍進行迂迴、包圍等機動，與同等規模的敵軍進行決定性會戰，整個作戰行動所需的指揮管制、後勤補給，都進一步改變對時間與空間的認知。這就是一種意義重新建構的過程。

1905 年的施里芬計畫不是一個兩面作戰的計畫，對認識這個計畫與 1914 年德國進入一戰之小毛奇計畫的關係有重大影響。由於對俄軍不可能支援的確定，這個單獨對法作戰的計畫並非以追求快速決定性會戰為目標，而是企圖摧毀法國的軍隊，使其無法在短期內威脅德國。正因如此，時間因素並沒有帶來一般認為的沉重壓力，這與 1914 年的狀況完全不同。施里芬計畫中的作戰地圖確實標出了動員後第 22 與 31 天的德軍預期位置，除此之外就沒有任何時間上的安排，更沒有所謂「6 週之內必須擊敗法軍」的字句。第 22 天的地圖（Map 2）是德軍右翼通過了荷、比、盧三國，準備進入法境的前夕。重點在安排戰鬥序列，顯示右翼大迴旋運動的路徑；22 天是依據最外側軍團所需繞經的最長距離推算的（Ritter, 1958: 188）。關於這個階段，正文中僅要求通過默茲河以北布魯塞爾與那慕爾之間前進的部隊，務必在與敵軍遭遇之前快速通過，否則 9 個現役軍的展開會受到阻撓（p. 139）。第 31 天的地圖（Map 3），則是德軍右翼最外側抵達索穆河（Somme）一線的狀況（p. 189）。此時德軍面臨重要抉擇，而法軍的行動直接影響德軍後續推進的方向。著名的繞行巴黎左側的包圍行動，其實是施里芬眼中最糟的狀況：法軍躲在瓦茲河—恩河一線據點後方拒絕出戰。因此，31 天也只是個參考點。地圖的要旨在說明，若是萬不得已必須包圍巴黎，如何安排戰鬥序列，以及其他部隊配合發動攻擊的位置，並藉此強調德軍現有兵力不足以執行這樣的任務（pp. 143-44）。

除了時間認知的差異，施里芬計畫的兵力配置與 1914 年實戰狀況的比較，也引起許多爭議。從 1920 年代開始，就出現一種說法，認為小毛奇之所以在 1914 年大敗於馬恩河，是因為將施里芬計畫中規劃的右翼、左翼兵力比由 7:1 降為 3:1 所致（Holmes, 2004: 193-194; Zuber, 2002: 28-29）。這種從相對兵力角度出發的論點，不僅與事實不符，也強化了研究者對德國作戰思想攻擊性的印象。

從作戰層級分析，所謂的右翼應該限定在參加通過比、盧進軍法國之輪型運動的所有部隊，剩下的則可統稱為左翼。施里芬本人的敘述方式，在某種程度上造成了誤解，他提到有 23 個現役軍與 12½ 個後備軍，將集結在麥次—韋塞爾之間，向著凡爾登—敦克爾克一線以大迴旋的輪型運動前

進（見上文）。但在這些部隊中，有整整 5 個後備軍（一個軍團）並不隨右翼前進，因為他們的任務在保護攻擊主力的南面側翼，防備來自圖勒—凡爾登方向法軍的攻擊。他們直接面對這兩大要塞之間的地區。開戰之後，一般稱為左翼的 $3\frac{1}{2}$ 個現役軍與 $1\frac{1}{2}$ 個後備軍將率先發動對南錫的攻勢，而前述 5 個後備軍則在麥次西方維持防守態勢，目的在牽制大量法軍使其無法北上。在稍後的發展中，2 個左翼現役軍將被北調增強右翼，而使左翼發生重大變化。留在摩澤爾河右側的部隊或能得到 2 個新建軍的增援，將前進貝爾福與南錫之間摩澤爾河一線；同時，這 5 個後備軍將攻擊圖勒—凡爾登之間的要塞。此處的任務明確設定為攻擊，而非僅是前進而已。由於其攻擊正面較窄，預期可以造成較大衝擊，而將法軍束縛於戰場上。這支部隊的任務都在洛林地區，因此其隸屬於左翼戰鬥序列的事實毋庸置疑。這樣重新計算之後，施里芬的兵力分配應為 3:1，而非 7:1；小毛奇將他西線兵力的四分之三分配到進攻比利時的右翼，並未遠離施里芬的原始構想（Holmes, 2014: 194-96）。

問題或許不在左右翼兵力比例上的差距，而在右翼的兵力構成上。施里芬說明了渡過默茲河（分別由列日上、下游）的兵力為 9 個現役軍與 7 個後備軍(I)，這合計 16 個軍就是施里芬自己所謂的右翼，其行進方向是布魯塞爾—那慕爾；緊接著的一段另有分別朝向那慕爾—梅濟耶與梅濟耶—凡爾登兩個方向的 14 個現役軍(II)。前者與 1914 年 8 月 18 日小毛奇指定的右翼 3 個軍團合計 16 個軍完全相同，而後者大致與當時的中央軍團相似（Holmes, 2014: 196）。

然而，在進入決定性會戰階段後，施里芬與小毛奇的右翼組成就出現明顯差距。施里芬的右翼在逼近巴黎時，所有後備軍都離開了主力部隊，5 個留在安特衛普前方，另 2 個或是用來掩護主力之側翼與後方，或是調往中央部隊的前線。同時，前進中的右翼也得到自左翼調來的 2 個現役軍，與 6 個新編成替代軍（*Ersatzkorps*）的增強，使其總數達到 17 個軍。至於小毛奇的右翼，在馬恩河會戰前夕，已在安特衛普與莫伯日（Maubeuge）各留下 1 個後備軍，並將 2 個現役軍調至東線戰區，所以總數僅剩下 12 個軍，比同階段施里芬的右翼足足少了 5 個軍。這個絕對數量（absolute numbers）

上巨大的差距，用主流觀點中的相對兵力（relative strength）角度是看不出來的：1914 年德軍接近巴黎—凡爾登一線時，小毛奇右翼兵力約為整個西線部隊的三分之一，這正是施里芬計畫在同一階段時的兵力比例（Holmes, 2014: 196-97）。因此，長久以來從相對兵力觀點出發的分析，不僅模糊了時間、空間、與兵力三個因素之間的關係，也掩蓋了施里芬與小毛奇在作戰思想上的根本歧異。

陸、1905 與 1914 年：施里芬與小毛奇關於攻守優越性認知的歧異

拘泥於德軍左右翼之間兵力比例是一個錯誤的分析方向，相反地，清楚認識敵我兵力對比，卻是任何作戰計畫不可或缺的部分。前者將研究導向表層的數字遊戲，後者則有助於揭示計畫制訂過程中主客觀因素的互相建構。

施里芬計畫的前提是俄軍無力支援，而德國能將所有野戰部隊完全用於對法作戰中。這並非施里芬個人一廂情願的想像，法國參謀總長邦德澤克（Jean Pendevec）在 1904 年 11 月便對外交部長提出嚴肅的警示：在俄國顯然無力介入的情況下，一旦開戰，法國將被迫以 24 個軍對抗德國的 38 個軍。而從德國 1906-1907 年度的單獨對法作戰部署計畫中，也可以看到與邦德澤克近似的兵力差距評估：在將所有野戰部隊集中於西線的條件下，德國可部署 52 個現役師與 27 個後備師，而法國則有 40 個現役師與 15 個後備師可用（Ehlert, et al., 2014: 432-33）。然而，這 24 個師的差距對施里芬而言，遠非安全的保證。在 1905 年備忘錄撰寫過程中，他逐漸理解到法國令人驚訝的防禦能力。由於他認為採取防禦策略是法國的最佳選項，因此在他的分析中很重視解決法軍只守不攻的難題（Holmes, 2014: 199-200）。

在里特分類為施里芬計畫第七分段（Fragment VII）的文件中，施里芬討論到法軍在動用第二線兵力的情況下，其防禦能力將大為增強。此處的第二線兵力並非被指派為預備隊的現役兵力，而是擴大徵召而來的後備役人員。施里芬相信法軍最後勢必會動用龐大的後備役人力，這些之前未被

編入野戰單位的援軍會被送到前線填補出現的缺口；同時，還可將防線一直延伸到巴黎，而不致出現德軍可突破的薄弱防區。在備忘錄第 6 手稿中，施里芬得知法軍的防禦能因地方民兵的動員而進一步加強時，德軍進攻的勝算顯得更加不確定。此時跟隨德軍主力前進的民兵旅已經被分配到監視敵人要塞、保護後勤補給線等任務。防守者可自由地運用其第三線兵力於立即的防禦任務，而進攻者卻無法將第三線兵力用於攻擊行動，因為他們幾乎已全部被用於整個攻勢作戰的輔助任務上。施里芬接著提到，德、法兩軍終將於凡爾登—拉費賀—巴黎一線上展開會戰，這是第二條要塞化防線，與貝爾福至凡爾登的第一條防線連結。經過計算，法軍在這個由貝爾福至巴黎長達 500 公里的正面上，可維持每公尺 4 名步兵的防守密度。而德軍已將 5 個後備軍留在 Antwerp，僅剩 830 個營的兵力，相當於每公尺 2 名步兵。此時施里芬深刻地體會到了攻守兵力變化的律則（Holmes, 2014: 201-203）。

這個看法在接替邦德澤克為法國參謀總長的潘恩（Jean Brun）處得到印證。潘恩承認，在戰爭開始的階段，法軍必須採取守勢，並被迫放棄一大片領土，最壞的情況可能得後撤到塞納河—奧伯河（Aube）一線。然而，他也從攻勢限制點（*le point limite de l'offense*）律則中得到鼓勵。德軍在前進的過程中，將逐漸喪失其力量，最終會形成停滯狀態，這就為力量的翻轉（*renversement des forces*）創造了機會；只要守軍能維持士氣與行動自由，勝利終將降臨防守的一方。潘恩的攻勢限制點相當於克勞塞維茲的攻勢頂點（*culminating point of the attack*），指的是攻方耗盡了初始的優勢，而雙方力量達到平衡的點。力量的翻轉則是克勞塞維茲說的：當攻方超過了攻勢頂點，情勢就會發生逆轉，守方發動反攻的力量將會超過攻方發起攻擊時的強度。施里芬計畫的各手稿可以被視為克勞塞維茲「防禦是較強的作戰方式」理論的個案研究，而其結論與法軍的見解幾乎一致（Holmes, 2014: 203）。

1911 年時，小毛奇在施里芬計畫的原始文件上寫了一些評論，錯誤地認為該計畫可用於兩面作戰。他同意「在開戰時以強大兵力進攻法國，而僅以少量兵力在東線抵禦俄國」的概念；使用借道比利時進攻法國的計畫，

他可在開闊戰場上迅速擊敗法軍，然後將部隊調至東線。這種理解明顯偏離了施里芬的想法。首先，施里芬從未在兩面作戰的想定中，提議借道比利時入侵法國的戰略攻勢。1905 年備忘錄中的想定是單獨對法作戰，俄國無力扮演重要的角色，所以能將全部德軍兵力都集中在西線，之後也不會有緊急的東線戰況需要增援（如 1914 年發生的情況）。其次，施里芬也未曾預期德軍在迂迴了邊境據點後，將在開闊戰場上快速地擊敗法軍。相反地，他認為法軍會後撤到巴黎—凡爾登之間的第二道要塞防線堅守；而想克服這些據點，德軍所需的兵力將遠遠超過在兩面作戰情況下可以部署於西線的數量（Holmes, 2014: 207）。

隨著法軍的攻勢主義在 1911 年重新成為主流，施里芬 1905 年時最擔心的法軍堅守不戰問題，似乎已不復存在¹⁶。小毛奇似乎受到這個不同「時代氛圍」（*Zeitgeist*）的影響，以完全不同的角度看待右翼大迴旋運動的設計。他認為如果法軍大舉攻擊穿越比利時的德軍，並被擊敗退回法國境內，此時的撤退應該不會如施里芬所擔心的如此有序與及時。因此，對施里芬而言接下來的大型圍城（*siege*）行動，在小毛奇看來就成了追擊（*pursuit*）。換言之，小毛奇是以不同的作戰概念定義進入法國之後的行動。在克勞塞維茲的追擊原則中，最有效的形式，是結合對撤退中敵軍正面施加持續的壓力，與一個同時迂迴敵軍側翼並威脅其退卻路線的平行運動（*parallel march*）。這些匯集的壓力，將會加速敵軍的失控與崩解（Clausewitz, 1993: 319-21）。小毛奇曾希望遵循這個追擊原則，但卻失去對整個局勢的控制（Holmes, 2001: 227）。

1914 年 8 月間一連串邊境會戰雖未能取得決定性戰果，但德國最高統帥部得到的各種情報都顯示法軍已經潰敗，只要繼續追擊下去，就能將法軍完全殲滅（Holmes, 2001: 228）。由於東線戰事吃緊，小毛奇決定於 8 月 25、26 日將 2 個現役軍調往東線。而在法國，經過急行軍的第 1 軍團已經超越了第 2 軍團先行渡過馬恩河，並發現自己處於巴黎的攻擊範圍內。在

¹⁶ 法國攻勢主義潮流是「攻擊至極限」（*offensive à outrance*）概念的發展，主要代表人物為福煦（Ferdinand Foch）（Notin, 2008）。

這個德軍右翼的頂端，敵我兵力對比已經出現變化，20 個德國師現在必須對抗 30 個英、法師。法國的鐵路系統讓法軍得以快速重新部署，並獲得後勤支援，而德軍則已面臨嚴重的運補困境（Mombauer, 2010: 71-73）。這支用來執行決定性會戰的部隊，攻勢行動的箭頭，轉眼卻成為整個戰役中的「阿基里斯腳踝」（Achilles' heel）¹⁷（Holmes, 2014: 21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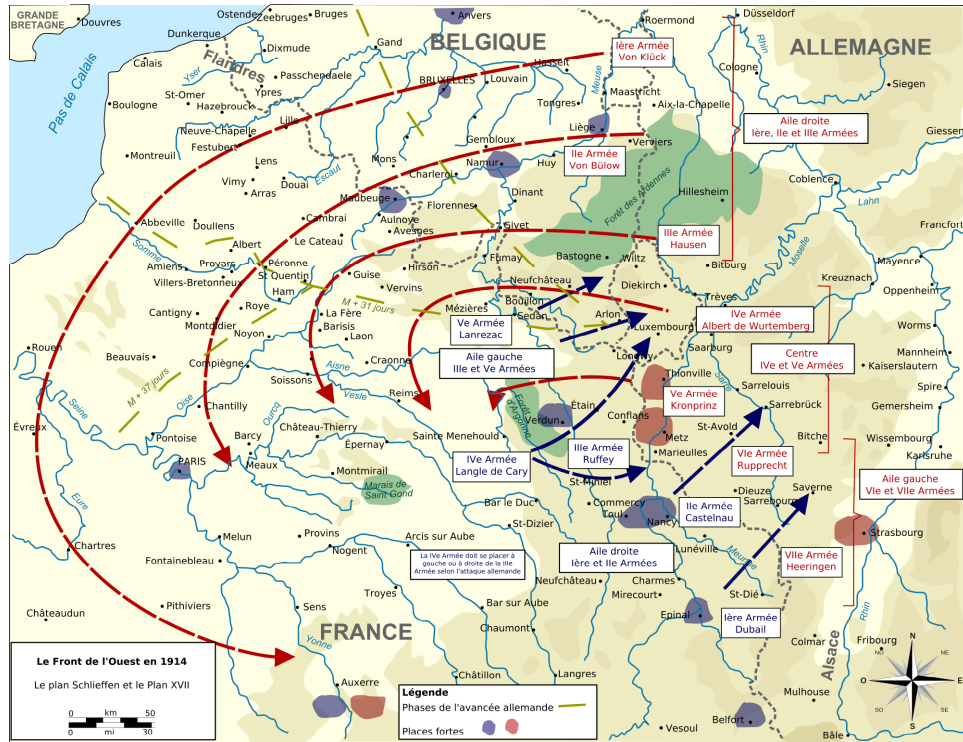
小毛奇的困境施里芬早就警告過：法軍可以建置由巴黎到凡爾登的連續防線來阻擋德軍前進。施里芬計畫的結論是，德軍必須足夠強大，在由巴黎西面迂迴整個要塞體系的同時，還能將法軍牽制在防線上，才可能達成決定性結果。他並計算出完成這樣的行動所需要的最低兵力是 33½ 個軍，其中包括 25 個現役軍。而小毛奇在巴黎—凡爾登一線的兵力只有 22 個軍，其中 15 個是現役軍。就配備重砲的現役第一線部隊來比較，小毛奇整整比施里芬的最低要求少了 10 個軍。即使小毛奇從左翼調來 2 個軍，如施里芬在接近巴黎時會做的一樣，他依然只有 24 個軍，遠低於施里芬認定還太弱的 33½ 個軍。除了在兩面作戰中用了單面作戰計畫的錯誤外，小毛奇還嚴重低估了防守與攻擊之間的兵力差距因現代火力的發展而大增，過度自信地將進入法國後的行動定義為追擊，終於招致巨大災難（Holmes, 2014: 211）。

陷於巴黎東面暴露位置的德軍右翼，已經面臨法國重新組建的第 6 軍團威脅。此時小毛奇若希望將攻勢轉向左翼，首先得將右翼從險境中救出，這就是為何新的作戰計畫包含了兩個方面的行動。當小毛奇下令左翼攻擊法國邊境要塞防線時，他命令第 1、2 軍團停止前進，開始後撤到可以向西面對來自巴黎法軍攻擊的據點，兩個軍團之間要密切相互支援。但小毛奇似乎完全不瞭解右翼受威脅的程度，兩軍團之間的協作已經十分困難。德軍第 2 軍團與半數的第 3 軍團合計 134 個營，正與敵軍 268 個營正面對峙。很難想像在自己所處區域中僅及對手一半兵力的第 2 軍團，能有餘力支援第 1 軍團對抗來自巴黎的威脅（Holmes, 2014: 211）。

¹⁷ 「阿基里斯腳踝」指致命弱點，或唯一的弱點，典故出自荷馬（Homer）史詩《伊利亞德》（*Iliad*）。

克魯克（Alexander von Kluck）的第 1 軍團合計有 128 個營，必須獨自面對法國第 6 軍團的 127 個營與英國遠征軍的 64 個營。9 月 5 日傍晚，克魯克命令旗下所有單位第二天開始撤至與第 2 軍團對齊的防禦位置。就在 6 日這一天，他的右側翼受到來自 Paris 的攻擊。7 日中午，克魯克將幾乎全部的兵力投入烏爾克河（Ourcq）的會戰，而導致第 1、2 軍團之間出現了致命的缺口（Holmes, 2014: 211-12）。9 日，第 1、2 軍團退到馬恩河後方。11 日，小毛奇視察右翼各軍團司令部，由於擔心敵軍從第 2、3 軍團的接點突破，將第 1、2 軍團與主力隔離，加以包圍後殲滅，只好命令第 3、4、5 軍團都後撤，重組完整的正面（Mombauer, 2010: 74）。這場馬恩河會戰以德軍失敗告終。之後經過一個多月嘗試迂迴對方側翼的「朝海岸賽跑」（race to the sea），西線戰場停滯成陣地戰（war of position），雙方將在由瑞士邊界延伸到北海的漫長戰壕中對峙 4 年。

小毛奇錯誤地將施里芬於 1905 年所設計，在單獨對法作戰時克服法國強大縱深防禦（defense in depth）的計畫，用於 1914 年的兩面作戰中。事實上，他將施里芬計畫中確信防守優越性的思考完全捨棄，代之以攻勢至上的狂熱。范艾弗拉（1984）所謂的「攻勢崇拜」是否可視之為一戰的起因，本文無法進一步探討，但這股在一戰前十年左右興起的攻勢至上論，確實影響了歐陸強權的作戰思想，或許應該如格雷一般以外生的信念來處理這個導致錯誤戰略實踐的因素（Gray, 2010: 28-33）。如果說施里芬仍遵循克勞塞維茲以來的大部分軍事準則，小毛奇與其同時代人則傾向於片面地奉行《戰爭論》中與攻擊有關的內容，並用精神力量的優越性來說服自己與反對者。因此，從施里芬到小毛奇，並非如范艾弗拉與史耐德（Jack L. Snyder）聲稱的是攻勢崇拜一貫性的發展與強化（Van Evera, 1984, 1999; Snyder, 1984a, 1984b, 1985, 2008），也非如祖伯（1999）以施里芬計畫並不存在來推論德國是基於自衛捲入戰爭；而是兩個截然不同作戰思想之間的斷裂。僅從作戰計畫的輪廓，對兵力擴張的要求，攻擊或防守詞彙出現比例來觀察，看不到這個本質上差異的存在，這是導致國際關係學者錯誤推論的根源。



來源：Wikimedia Commons (2015)。

圖 1：第一次世界大戰西方戰線

柒、結論：因果解釋或脈絡建構

守勢現實主義對一戰的研究從探索戰爭的起因出發，發展出安全困境、螺旋模式、與攻勢—守勢變項等重要概念。對范艾弗拉與史耐德等學者而言，施里芬計畫是連結整套一戰因果解釋的重要環節：德國採納了這個攻勢至上的戰略，讓整個歐洲陷入導致戰爭的危機上升螺旋。令人意外的是，他們認為施里芬計畫既是攻勢崇拜的產物（錯誤的理解），也是其他國家攻勢崇拜的起因，卻在這些研究中以類似外生因素來看待這個計畫。似乎只要將施里芬計畫定位成所有危險的根源，就能自圓其說。於是，國際關係學者便可以放心地從國際結構的結盟關係與軍備競賽、國內民族主義熱潮與大眾政治參與、殖民主義經濟競爭、威脅性的外交手段等面向建

立抽象化的因果模式。

本文所質疑的首先就是因果模式的適切性。當歷史學界經過將近一個世紀的爭論，逐漸從「一戰為何會發生」(why)轉向「一戰如何發生」(how)時，許多過去被忽略或視為理所當然的細節，被重新加以審視，而賦予一戰研究更深刻的內涵(Mombauer, 2015: 563; Williamson & May, 2007)。爲了理論上的簡約(parsimony)要求，而一味堅持從因果模式來研究，必定會導致理論與現實的脫節。利維關於德國是否基於預防性戰爭考量進入一戰的研究，就發現現有的證據遠不足以肯定因果模式的結論(Levy, 2014: 163-66)。對與施里芬計畫有關新史料的研究，就質疑了上述守勢現實主義理論的有效性，利伯甚至認為整個安全困境理論都需要重新檢視(Lieber, 2007: 166)。利伯的結論或許下得太快，因爲仍有其他支持安全困境概念的案例存在；而他用祖伯的「施里芬計畫不存在論」來支持自己的立場，事實上也讓他陷入另一個矛盾中：祖伯想證明的是德國沒有戰爭罪責，而利伯卻認為德國的擴張野心導致了一戰(Zuber, 2002: 5; Lieber, 2007: 191)。

施里芬計畫是真實的存在。但將這個計畫視為因果模式中的一個變項之研究策略，誤導了我們對這個計畫本身的理解。本文嘗試將施里芬計畫放回歷史脈絡中檢視，將之視為戰略層級中的作戰計畫來理解，並由空間、時間、兵力三個作戰要素的相互建構來認識德國作戰思想的演變。首先，作戰計畫不能用來支持大戰略層級的攻勢崇拜假設，政治領導人一旦決定進入戰爭，戰爭計畫的設計與執行者就只有一個目標：贏得勝利。文人政府失去對戰爭控制的說法是不正確的。而從施里芬的作戰思想來看，作戰層級的守勢與攻勢行動，往往是並存於計畫之中的，無法由單一作戰計畫得出攻勢崇拜存在的結論。

其次，施里芬計畫是1905年單獨對法作戰的計畫，並無兩面作戰形諸空間、時間、兵力的壓力，與1914年完全不同。三者之間的互相建構，還必須加上計畫制訂者主觀認知的差異：施里芬秉持克勞塞維茲以來德國戰略思考中一貫的「防禦是較強的作戰方式」信念思索德國戰略困境，而小毛奇卻成為攻勢至上主義的信徒，將德國軍隊帶上毀滅之路。就各自不同的歷史脈絡來看，施里芬處於高爆彈藥加強了攻勢效力的時代，而小毛奇

則在日俄戰爭證明了強化要塞與機槍使用對防禦的重要貢獻之際，接任參謀總長一職，兩者的作戰思考都與軍事技術發展的趨勢背道而馳。若是肯細究作戰計畫的內容，就會發現攻勢—守勢平衡的假設事實上不能從一戰經驗中得到證明。這些觀察雖然不足以全盤推翻攻勢—守勢理論，或是質疑安全困境概念的有效性，但卻指出從刻意追求簡約性的理論途徑出發，可能會限制我們對歷史多重面向的認識。

參考文獻

- Baylis, John, James J. Wirts, and Colin S. Gray, eds. 2016. *Strategy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lausewitz, Carl von. 1993 [1832]. *On War*.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 Copland, Dale C. 2000. *The Origins of Major Wa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De Gaulle, Charles. 1946. "Discours prononcé à Bar-le-Duc." (<http://mjp.univ-perp.fr/textes/degaulle28071946.htm>) (2019/1/1)
- Ehlert, Hans, Michael Epkenhans, and Gerhard P. Gross, eds. 2014. *The Schlieffen Pl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the German Strategy for World War I*.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 Foley, Robert T. 2014. "The Schlieffen Plan: A War Plan," in Hans Ehlert, Michael Epkenhans, and Gerhard P. Gross, eds. *The Schlieffen Pl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the German Strategy for World War I*, pp. 67-83.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 Glaser, Charles L. 1997. "The Security Dilemma Revisited." *World Politics*, Vol. 50, No. 1, pp. 171-201.
- Glaser, Charles L. and Chaim Kaufmann. 1998. "What is the Offense-Defense Balance and Can We Measure i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No. 4, pp. 44-82.
- Gray, Colin S. 2010. *The Strategy Bridge: Theory for Practi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ray, Colin S. 2015. *The Future of Strate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Gross, Gerhard P. 2014. "There Was a Schlieffen Plan: New Sources on the History of German Military Planning," in Hans Ehlert, Michael Epkenhans, and Gerhard P. Gross, eds. *The Schlieffen Pl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the German Strategy for World War I*, pp. 85-136.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 Gross, Gerhard P. 2016. *The Myth and Reality of German Warfare*.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 Herwig, Holger H. 1994. "Strategic uncertainties of a nation-state: Prussia-Germany, 1871-1918," in Williamson Murray, MacGregor Knox, and Alvin Bernstein, eds., *The Making of Strategy: Rules, States, and War*, pp. 242-7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euser, Beatrice. 2016. "The History of the Practice of Strategy from Antiquity to

- Napoleon,” in John Baylis, James J. Wirts, and Colin S. Gray, eds. *Strategy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pp. 17-3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olmes, Terence. 2001. “The Reluctant March on Paris: A Reply to Terence Zuber’s ‘The Schlieffen Plan Reconsidered’.” *War in History*, Vol. 8, No. 2, pp. 208-32.
- Holmes, Terence. 2014. “Absolute Numbers: The Schlieffen Plan as a Critique of German Strategy in 1914.” *War in History*, Vol. 21, No. 2, pp. 193-213.
- Holmes, Terence. 2014. 2004. “Schlieffen and the Avoidance of Tactics: A Reinvestigation.”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27, No. 4, pp. 663-84.
- Jervis, Robert. 1976.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Jervis, Robert. 1978.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 30, No. 2, pp. 167-214.
- Levy, Jack S. 1990/91. “Preferences, Constraints, and Choices in July 1914.”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5, No. 3, pp. 151-86.
- Levy, Jack S. 2014. “The sources of preventive logic in German decision-making in 1914,” in Jack S. Levy and John A. Vasquez, eds. *The Outbreak of the First World War: Structure, Politics, and Decision-Making*, pp. 139-6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iddell Hart, Basil H. 1997 [1930]. *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Papermac.
- Lieber, Keir A. 2000. “Grasping the Technological Peace: The Offense-Defense Balance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1, pp. 71-104.
- Lieber, Keir A. 2007. “The New History of World War I and What It Means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2, No. 2, pp. 155-91.
- Lieber, Keir A. 2008. “Correspondence: Defense Realism and the ‘New’ History of World War I.”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3, No. 1, pp. 185-94.
- Luttwak, Edward N. 2001. *Strategy: The Logic of War and Peace*. Cambridge: Belknap.
- Lynn-Jones, Sean M. 1986. “Détente and Deterrence: Anglo-German Relations, 1911-1914.”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1, No. 2, pp. 121-50.
- Mearsheimer, John. 2001.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 Mombauer, Annika. 2010. “German War Plans,” in Richard F. Hamilton and Holger H. Herwig, eds. *War Planning 1914*, pp. 48-7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ombauer, Annika. 2015. "Guilt or Responsibility? The Hundred-Year Debate on the Origins of World War I."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No. 48, pp. 541-64.
- Notin, Jean-Christophe. 2008. *Foch: le mythe et les réalités*. Paris: Perrin.
- Ritter, Gerhard. 1958 [1956]. *The Schlieffen Plan: Critique of a Myth*. London: Oswald Wolff Limited.
- Sagan, Scott D. 1986. "1914 Revisited: Allies, Offense, and Instabil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1, No. 2, pp. 151-75.
- Shimshoni, Jonathan. 1990/91. "Technology, Military Advantage, and World War I: A Case for Military Entrepreneurship."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5, No. 3, pp. 187-215.
- Snyder, Jack L. 1984a.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and the Cult of the Offensive, 1914 and 1984."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9, No. 1, pp. 20-58.
- Snyder, Jack L. 1984b. *The Ideology of the Offensive: Military Decision Making and the Disasters of 1914*.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Snyder, Jack L. 1985. "Perceptions of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1914," in Robert Jervis, Richard Ned Lebow, and Janice Cross, eds. *Psychology and Deterrence*, pp. 153-179.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Snyder, Jack L. 1991. *Myths of Empir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Snyder, Jack L. 2008. "Correspondence: Defensive Realism and the 'New' History of World War I."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3, No. 1, pp. 174-85.
- Stevenson, David. 2012. "Fortifications and the European Military Balance before 1914."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35, No. 6, pp. 829-59.
- Tang, Shiping. 2010. "Offence-defence Theory: Towards a Definitive Understanding."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3, pp. 213-60.
- Taylor, A. J. P. 1969. *War by Timetable: How the First World War Begun*. London: Macdonald and Company.
- Trachtenberg, Marc. 1990/1. "The Meaning of Mobilization in 1914."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5, No. 3, pp. 120-50.
- Tuchman, Barbara W. 1962. *The Guns of August*. New York: Random House.
- Van Evera, Stephen. 1984. "The Cult of the Offensiv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9, No. 1, pp. 58-107.
- Van Evera, Stephen. 1999. *Causes of War: 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Wikimedia Commons. 2015. "Schlieffen Plan fr.svg."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

wiki/File:Schlieffen_Plan_fr.svg) (2019/1/1)

Williamson, Samuel R., Jr., and Ernest R. May. 2007. "An Identity of Opinions: Historians and July 1914."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79, No. 2, pp. 335-87.

Zuber, Terence. 1999. "The Schlieffen Plan Reconsidered." *War in History*, Vol. 6, No. 3, pp. 262-305.

Zuber, Terence. 2002. *Inventing the Schlieffen Plan: German War Planning 1871-191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Zuber, Terence. 2004. *German War Planning, 1891-1914: Sources and Interpretations*. Woodbridge: Boydell Press.

Shlieffen Plan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Ting-sheng Lin

*Associate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Quebec at Montreal,
CANADA*

Abstract

In the defensive realist explanation of the case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the Schlieffen Plan served as the linchpin connecting the central concepts, but rare were th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ies' exploration into the nature of war plan (operational plan). This paper adopts the "levels of strategic studies" perspective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status of operational plan, and questions the thesis that considers the Schlieffen Plan as representative of the cult of offensive within a causal model. Through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formal deployment plans devised by German Great General Staff, and of the newly discovered military archives, we find several questions that cannot be explained by the offense-defense balance theory. This article hence proposes a constructivist framework, which focus on the relationship amongst space, time, and force, for reviewing the evolution of German operational thought. We further point out that there was a rupture in terms of operational tradition between Schlieffen and Moltke the Younger, from the belief in defensive superiority toward the fever of attack.

Keywords: First World War, Defensive Realism, war plan, operational thinking, Constructivism